

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析*

——基于社会支持、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

金晓彤^{1,2} 崔宏静²

(¹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² 吉林大学商学院)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 715 份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卷, 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方法, 探讨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同时检验社会支持、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社会支持、社会比较在成就动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文章提出要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认知成就动机的正向驱动作用, 引导其进行适度的社会比较; 健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 加大对其社会支持的力度;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成就动机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社会比较

一、问题提出与现有研究

经过 30 年民工潮的风起云涌, 农民工阵营已经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 作为农民工群体再分化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 已经日渐成为农民工阵营的主力军, 并已日益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向往成功、希望实现创业理想, 更加重视个人的发展机会。调查显示, 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和家庭温暖一起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目标取向(王焕举, 2010)。成就动机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受的重要因素。

当前, 多方调查显示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不幸福的感受。这种不幸福的感受极易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甚至会诱发其心理问题, 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张晓丹, 2010)。2010 年, 中国政府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受的影响机制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蔚为必要。

幸福感和成就动机是心理学中非常受关注的概念, 许多心理学文献都表明成就动机对于个体的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Cassidy, 1988)。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个体成就动机对幸福感水平的有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编号: 12JZD0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消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2AZD02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雇佣歧视及其反生产行为研究”(项目编号: 12BGL05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编号: 11YJA630096)的资助。

效预测作用 (Kennon, 2001; 张登浩, 2008), 但现有文献的研究多集中于证明二者的相关性, 而成就动机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如何? 这种影响的产生是否会受到其他条件因素的影响? 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重要而又特殊的群体, 其成就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又会有怎样的体现? 现有研究还不能完全回答上述问题。

基于此, 本研究将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进一步发现这一关系中的主要调节变量, 由此来解释成就动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具体来讲, 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 验证成就动机对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同时, 本文认为有两种因素可能调节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倾向。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

主观幸福感 (SWB) 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 这种评价是基于其自己所选择的标准来进行的 (Shin 和 Johnson, 1978)。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综合的评价, 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整体性三个特性 (Diener, 1999)。Andrews 和 Withey (1976) 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成分, 分别是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 (Andrews and Withey, 1976; Diener, 1999)。其中,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别指个体在一定时间段内所经历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体验; 生活满意度就是指个体构建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标准, 并将其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工作、婚姻、健康等) 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定自己的满意感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较高的成就动机, 使得他们有了更高的追求和目标, 而城市新移民的身份使他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 因而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相应增多, 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进行比较的倾向和其所受到的外在社会支持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选取成就动机作为自变量, 并以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倾向两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问题。

(一) 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成就动机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是人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力求获得成功的内部动因, 也即个体愿意去践行自己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情, 并努力达到完美的一种内部推动力量 (Nicholls, 1982)。成就动机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即行为的目的性、主动性和坚持性, 目的性指在活动中对自己和他人的超越; 主动性指是个体行动的自愿、自觉、自主性; 坚持性指在行动过程中抵制干扰, 坚持完成目标 (张德等, 2001)。根据 Atkinson (1964) 的研究, 成就动机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 (Hope of Success) 和避免失败的动机 (Fear of Failure) 两个维度。成就动机对于个体的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 (Cassidy, 1988), 个体所追求目标的内容及原因都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另外, Cassidy (2000) 发现成就动机与心理幸福感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有很高的相关性, 高水平的成就动机对于较好的心理幸福感和更高的自我健康报告情况十分重要。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向往成功、拥有创业的理想, 重视个人的发展机会和自我实现。事业成功是新生代农民工幸福目标取向的重要构成部分 (王焕举, 2010)。成就动机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受的重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1:

H₁: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H_{1a}: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成功的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_{1b}: 新生代农民工避免失败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

(二)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社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影响,个体通过各种社会网络来获得这种影响,它能够帮助个体减轻心理反应、缓解当前的紧张精神状态、帮助个体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Turner, 1992)。社会支持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心理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个体在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时,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都会比较高,而消极情感比较低(Chou, 1999)。

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心理健康有影响。对于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在利用提高社会支持促进心理健康的过程中,需要采用不同的支持方式(肖蓉, 2004)。而根据 McClelland (1958)的研究,成就动机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或内在的心理倾向,同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两维度恰好是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一个构念(Bradburn, 1969)。由此,成就动机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将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作为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城市的新环境使得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有了新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支持状况下,具有不同成就动机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会呈现不同的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H₂: 相对于低社会支持,获得高社会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追求成功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加强。

H₃: 相对于低社会支持,获得高社会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避免失败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减弱。

(三) 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

根据 Festinger (1954)的定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的能力、感觉、境况、观点等与别人进行比较的过程称为社会比较。Gibbons 和 Buunk (1999)提出了社会比较倾向(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这一概念来描述个体致力于社会比较行为的人格倾向。这类个体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他们总是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与自己相联系,只要情境相似,就会对与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关的信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社会比较倾向比较强的人,感到不如别人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感到比别人强时又容易自高自大,影响主观幸福感。

社会比较与一些心理特征变量(如控制感和自尊等)的交互作用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Wood, 1989)。而成就动机作为个体的一项重要心理特征,当其与社会比较交互作用时,也很可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成就动机,他们的社会比较倾向也会因人而异,因此,当他们走出农村,面对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成就动机和社会比较倾向的交互作用将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和假设 5:

H₄: 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追求成功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减弱。

H₅: 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避免失败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加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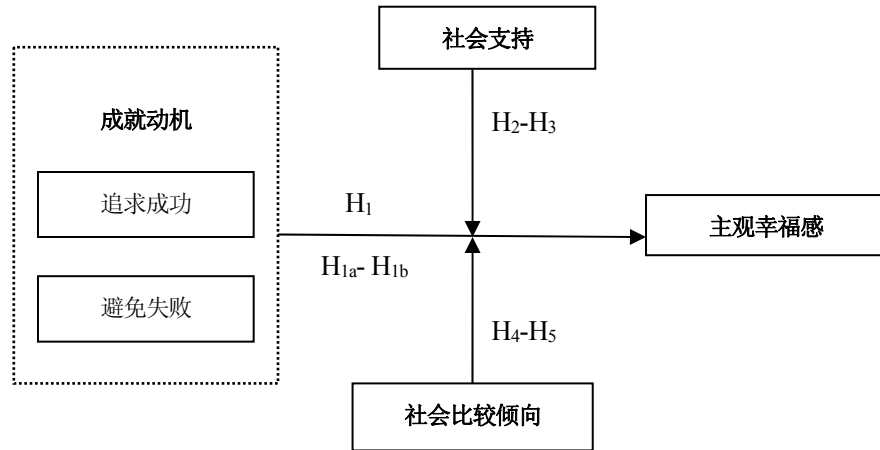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

1.变量测量。本研究主要采用面访作为数据收集的方式，数据收集的工具为调查问卷，问卷主要由主观幸福感量表、成就动机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社会比较倾向量表构成。

主观幸福感量表：本文采用 Diener 等人在 1985 年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感体验三个分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研究采用 Gjesme,T 和 Nygard,R 于 1970 年编订，由叶仁敏和 Nygard,R.（1988）译制的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简称 AMS）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进行测量，量表由追求成功动机分量表和避免失败动机分量表两部分构成。

社会支持量表：本研究采用肖水源（1993）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简称 SSRS），作为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工具。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本文采用由 F.X.Gibbons 和 B.P.Buunk（1999）合作编制的《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INCOM）》，主要是用来评价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的差异。

2.信度和效度检验。根据研究目的和检验假设的需要，本文将使用 SPSS18.0 进行信度的分析，使用 AMOS18.0 统计软件对量表效度进行分析。

在预测试阶段，本研究先进行了样本规模为 60 人的检验，以保证后续调查的准确性。预测试结果显示，以上所采用的三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表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名称	Cronbach's α	CR	AVE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0.839	0.886	0.609
积极情感	0.734	0.818	0.507
消极情感	0.876	0.904	0.521

(续表 1)

成就动机			
追求成功动机	0.883	0.903	0.542
避免失败动机	0.894	0.873	0.567
社会支持	0.787	0.840	0.533
社会比较倾向	0.763	0.864	0.502

在大样本调查阶段,对信度的检验,使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估计量表内部一致性。将 Cronbach's α 大于 0.7 判断为高信度。同时,用综合信度 (CR) 和平均变量抽取量 (AVE) 两个指标来分析量表的效度,当 CR 值大于 0.7, AVE 值大于 0.5 时,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具体分析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 数据分析

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检验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支持、社会比较倾向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口学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建立分层回归模型对调查所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1.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学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我们根据学者王春光 (2001) 的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 1980 年以后出生,户籍身份在农村,在农村长大,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已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实地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严格按照以上界定分别在长春、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青岛、武汉、深圳等城市随机抽取 863 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回收问卷 794 份,其中有效问卷 715 份。调查均由各地区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协助完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被调查对象的具体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学变量上的描述统计分析

频数 (人次)			百分比 (%)		
年龄			婚姻		
15~17 岁	77	10.8	未婚	428	59.9
18~21 岁	182	25.5	已婚	283	39.5
22~27 岁	349	48.8	离异	4	0.6
28~32 岁	107	14.9	学历		
性别			小学及以下	54	7.5
男	428	59.9	初中	406	56.8
女	287	40.1	高中或中专	255	35.7

如表 2 所示,在所调查的 715 位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年龄一项上,22~27 岁所占比例最大,共有 349 人,占比 48.8%。未成年组有 77 人,占比为 10.8%,尽管这一比例在四个年龄组中占比最小,但可以发现,在农村中,未成年就外出务工的现象还很常见。在性别一项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有 428 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为 287 人,各自占比 59.9%、40.1%,也就是说在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要比女性多出近 10 个百分点。婚姻状况一项中,未婚者有 428 人,占比 59.9%,已婚者 283 人,占比 39.5%,另外离异 4 人,占比 0.6%。学历一项中,初中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最多,达 406 人,占比 56.8%,其次为高中或中专,共 255 人,占比 35.7%,小学及以下组人数最少,为 54 人,占比 7.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水平,小学及以下组仅有 7.5% 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之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升。

2.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以成就动机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 3 为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 SWB 的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追求成功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0.577$ ， $P<0.001$ ）；避免失败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beta=-0.287$ ， $P<0.001$ ）。据此，假设H₁，H_{1a}，H_{1b}成立。

表 3 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Beta 值	标准误差	T 值	Sig.	调整的.R ²	F 值
常量		2.586	2.012	0.045		
追求成功	0.577	0.034	19.916	0.000	0.611	561.459***
避免失败	-0.287	0.039	-9.899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的水平上显著。

3.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为检验社会支持在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我们建立分层回归模型（表 4）。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在模型 1 中以成就动机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在模型 2 中，加入社会支持及其分别与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之乘积（交互项），再次进行回归。通过比较分析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以检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表 4 检验社会支持、社会比较调节效应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eta (标准化系数)	T 值	Beta (标准化系数)	T 值
追求成功	0.577***	0.034	0.520**	2.811
避免失败	-0.287***	0.039	-0.926***	-4.655
社会支持	—	—	0.030	0.200
社会比较倾向	—	—	-0.661***	-4.244
追求成功×社会支持	—	—	0.477*	2.486
追求成功×社会比较倾向	—	—	-0.538***	-3.96
避免失败×社会支持	—	—	0.383*	2.469
避免失败×社会比较倾向	—	—	-0.409*	2.533
F 值	561.459***		171.071***	
调整后 R ²	0.611		0.657	

注：*，**，***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4 所示，在模型 1 中，回归结果显示，追求成功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显著（ $\beta=0.577$ ， $P<0.001$ ）；模型 2 中，追求成功动机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 $\beta=0.477$ ， $P<0.05$ ）。这一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成功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社会支持加强了追求成功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假设 H₂ 成立。

同时，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避免失败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显著（ $\beta=-0.287$ ， $P<0.001$ ）；模型 2 中，避免失败的动机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的正向作用显著 ($\beta=0.383$, $P<0.05$)。这一结果表明, 社会支持在新生代农民工避免失败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反向的调节作用, 即社会支持减弱了避免失败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假设 H₃ 成立。

4. 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为检验社会比较倾向在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建立分层回归模型 (表 4)。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 在模型 1 中以成就动机两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在模型 2 中, 加入社会比较倾向、社会比较倾向与追求成功动机的乘积 (交互项), 社会比较倾向与避免失败动机的乘积 (交互项), 再次进行回归。通过比较分析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以检验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

如表 4 所示, 在模型 1 中, 回归结果显示, 追求成功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显著 ($\beta=0.577$, $P<0.001$); 模型 2 中, 追求成功动机与社会比较倾向的交互项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显著 ($\beta=-0.538$, $P<0.001$)。这一结果显示, 社会比较倾向在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成功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反向的调节作用, 即社会比较减弱了追求成功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假设 H₄ 成立。

同时, 在模型 1 中, 避免失败的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显著 ($\beta=-0.287$, $P<0.001$); 而模型 2 中, 避免失败的动机与社会比较倾向的交互项, 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显著 ($\beta=-0.409$, $P<0.05$)。这一结果表明, 社会比较倾向在新生代农民工避免失败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即社会比较加强了避免失败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假设 H₅ 成立。

四、分析与讨论

成就动机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前因变量, 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上, 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实证的验证。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的外在社会支持和其内在的社会比较倾向, 也分别对成就动机两维度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一) 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有着显著影响, 其中追求成功的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 而避免失败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成功的动机越高, 避免失败的动机越低, 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就会越高, 相反则越低。研究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 其追求成功的动机更强, 更加的向往职业成功和自我实现。如此, 对应于较高的追求成功动机, 新生代农民工将有着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而对于那些避免失败动机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 其主观幸福感将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将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不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追求成功的动机是个体追求事业成功、向往实现自我的内在动因, 这一动机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内驱力, 而避免失败的动机则恰恰反之, 其起到的是一种阻滞作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之所以高避免失败动机的个体会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主要是因为他们惧怕在追求事业、发展自我的过程中面临困难, 害怕自己的努力无法换来同等的回报, 因此, 越是那些有着高避免失败动机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 更容易因为失败和打击而感到严重的挫败感, 由此才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二) 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社会支持越高,其追求成功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将会加强,而避免失败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将会减弱。这表明,社会支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水平,将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即包括来自新生代农民工亲人、朋友的支持,也包括来自外界社会的支持,比如同学、同事、社会团体,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受。

社会比较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比较倾向越高,其追求成功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将会减弱,而避免失败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将会加强。由此,无论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追求成功动机、还是较高的避免失败动机,如果其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那么他将会有比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比较有三种类型,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平行比较(parallel comparison)和下行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不同类型的比较对个体的情感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初入城市生活环境,他们比较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群体内和乡土生活中的个体,而是更多地变为了城市中的同龄人。但是,无论是在工作体面上还是生活质量上,无疑,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城市同龄人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这种在工作和生活维度上的上行比较,对于那些社会比较倾向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就会不可避免的受到负面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阵营的主力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是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内容。成就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而社会支持、社会比较倾向对二者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 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认知成就动机的正向驱动作用,引导其进行适切的社会比较

追求成功的动机是个体实现自我的内在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利用这种正向的驱动力量,抑制避免失败动机的阻滞作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和困难,如此才能形成对待挫折的积极健康的心态,这不但是个体提高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获得事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提。社会比较倾向的高低是个体的重要人格特征,它没有对错之分,也不能轻易改变。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选择进行正确的、适切的社会比较有利于调整情绪、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具体而言,在社会比较的类型上,倾向于社会比较的新生代农民工,要综合考虑上行、平行和下行比较的意义,以形成对事情比较全面的认知,要避免局限于进行上行比较,因为过大的差距感会挫败个体前进的动力,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和幸福感受的提升。

(二) 健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大对其社会支持的力度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各类问题,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广泛和有力的社会支持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得到的社会支持一般还仅限于家庭和朋友圈子,支持力度也还不够,这一现状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因此,健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同时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力度,对于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在个体和家庭支持之外,政府应鼓励农民工工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机构、非盈利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为全面而专业的社会支持服务,由此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狭小的、以血缘和业缘为主的关系网络,形成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帮助,从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三)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比较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差异的存在。成就动机和社会比较倾向是个体的两项心理特征,在控制外界环境的情况下,这类特征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不会轻易改变。因此,要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比较倾向的影响,提高其幸福感,还要从产生比较的根本原因出发,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城市同龄群体的差异。当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已经很少从事传统的脏乱差的工作,相当一部分人与城市户口的工作者从事同样的工作内容,然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却远远低于城市户口的工作者。这种差异的存在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偏低状况的根本原因。简言之,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会在与城市居民群体的社会比较中产生负向情绪,主要是因为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的存在。因此,要想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改变他们的生活满意水平,就要从根源入手,逐步缩小城乡二元差距,改变现有城乡两级管理体制,逐步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保障和待遇。

参考文献

- (1) Cassidy, A. J.: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h.D., Sunderland Polytechnic (United Kingdom), 1988.
- (2) Kennon, M. S. and Tim, K.: Goals, Congruence and Positive Well-being: New Empirical Support or Humanistic Theories, *Th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1(1): 30-51, 2001.
- (3) Shin, D. C. and Johnson, D. 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 475-492, 1978.
- (4) Andrews, F. M. and Withey, S. B.: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 being, New York: Plenum, 1976.
- (5) Diener, Ed; Lucas, 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y Bulletin*, 125(2):276-294, 1999.
- (6) Nicholls, J.G: Motivation, In: H. E. Mitzled: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Research (15ed)*, New York: Macmillian, 1982.
- (7) Atkinson, J. and Birch, D.: *An introduction to Motivati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4.
- (8) Turner, R. J.: Measuring Social Support: Issues of Concept and Method, In H. Veiel and U.Bauman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Social Support (eds.)*. New York: Hemisphere, 1992.
- (9) Chou and Kee-Le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0(3): 319, 1999.
- (10) McClelland, D. C.: *Methods of Measuring Human Motivation*. In J. W. Atkinson (eds.), *Motives in Fantasy, Action and Societ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58.
- (11) Bradburn, N.: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1969.
- (12)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d, *Human Relation*, 7: 117-140, 1954.
- (13) Wood, J. V.: Theory and Research Concerning Social Comparison of Personal Attribut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2): 231-248, 1989.
- (14) 王焕举:《80、90后农民工的幸福观》,《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7期。
- (15) 张晓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韶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 (16) 张登浩:《基层党政干部的人格特质、成就动机与幸福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17) 张德、赫文彦:《关于成就动机的几个问题》,《心理科学》2001年第1期。
- (18) 肖蓉:《驻岛礁军人社会支持、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第一军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19)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越)

Survival or Development, Advantage or Right: An Analysis on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clination for Collective Action

.....Liang Hong (48)

The effect factors of the inclin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igrant worker samples investigation data of the peasant labore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research" in 2010. It is showed that their inclination for collective action is mainly from the demand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ubjective sense of deprivation, mental state and the degree of legal rights being trampled on.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is one mass that attach importance to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righ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offering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itizen's right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besides protecting their basic rights.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Migrant Family Members' Urbanization

——A Logis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334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Shandong Province

.....Sun Zhanwen & Yang Xuecheng (59)

This paper proposed four stages of migrant family members' urbanization to analysis framework, using the Shandong province 1334 urban and rural survey data,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amily migration. Research shows,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four stages that affect the phase difference; migrant family members' structure, migrant family per capita expenditure, rural assets disposal intention and evaluation of city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the whole process of overall influence of family migration of urbanization; rural business income of the family and rural community welfare benefits to significant will affect the first two stages; age, living expenditure, the number of yea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at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ity workers system will affect the stage of whole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stage of whole family settle in the city;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migrant family members' urbanization needs according to each stage of the same influential elements on long-term policies, and also need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endemic a stage of the migration of targeted policie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Moder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Jin Xiaotong & Cui Hongjing (69)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715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discuss achievement motivation's influence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WB, and to test the moderation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s negative effect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WB; and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ly. To improv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WB, the positive force of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the right comparison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guided; th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enhanced; du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reform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to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141 Migrant Workers from 25 Provinces in China

..... Zeng Fusheng & Zhou Huaming (78)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141 migrant workers from 25 provinces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to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through building Multi-Ordered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bl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accumulative working time in the industry, accumulative working time on the post, the situation of skills tr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dustr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By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blood relationship and geo-relationship, enterprise lo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Specifically, the 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work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 the enterprise in inl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have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older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longer career experiences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more career skills train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get, the better career development they can have. In addition, several variables don't have significantly effect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which contain their marital status, the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enterprise's nature of the ownership.

CHINA RURAL SURVEY (CRS) is published bimonthly by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itor in Chief: Li Zhou

Deputy Editor in chief: Du Zhixiong

Code No.BM4476

Address: No.5, Jianguomennei Ave., Beijing, 100732,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